

村落视角下的货币属性、劳动供求与乡村振兴

李似鸿

(江西师范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从村落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货币和劳动的属性、形态、供求进行分析,得出资金和劳动双重闲置和双重外流并存,是造成乡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提出要使资金和劳动由闲到忙、由静向动、由流失到留用转变并有机结合,以响应实施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关键词:村落发展;货币属性;劳动供给;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830;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21)01-0003-18

一、前言

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包括自然村落、自然村、村庄区域。查《辞海》,村落,即村庄,“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1]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写道:“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2]郑燮诗云:“银沙万里无来迹,犬吠一声村落闲。”^[3]朱德同志在海南则写下了:“车过村落地,老少夹道迎。言语虽不通,笑貌传感情。”^[4]

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各有不同。笔者出生地担石村,^①即在两宋时由李世富创建,其墓碑刻石记下了在此建村原由:“公具文武全才,救命冠带,见当时辽兵入侵,高宗南渡,奸相弄权,名宦遇害,因未受敕。常游九宫山,遇异人,求栖身之地,偈云:‘一自西南去,荷石结为邻,逢椿须戾止,遇亭且安身。’公一日至宁州(今修水县)之大椿担石,询问前村何名,里人曰:此桥亭也。公恍然而悟,遂卜筑居之,为大椿始祖。传载谱首。”^②

同时避乱于此的,还有向氏兄弟。“向士凯,号凤山,河南安阳人,宋太尉向敏中六世孙,举哲宗元符三年进士,历官宣抚史。高宗建炎二年,同弟向士壁避乱徙居分宁县之后山,子孙因家焉。”“向士壁,号岐山,凯弟,举徽宗大观三年进士,历官枢密史。因避乱同兄徙分宁县后山,复迁李村金鼓山,年九十七,歿葬其地,其后子姓聚族于斯。”宋朝天台人、江湖诗派之父戴复古,曾长时间流寓于此,留下“鹅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等诗句。今鹅鸭塘、东西园等遗迹尤存。^③

江南不少村落形成的原因,与促使汉文化和人口由北向南迁移的三大事件“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基本吻合。^[5]不少家族,包括本地黄庭坚、临川晏殊、王安石、曾巩、汤显祖、庐陵欧阳修等,均因避乱由北往南迁徙。如晏殊,“其高祖讳墉,唐咸通中进士,卒官江西,始落籍于高安……曾祖讳延昌,又徙其籍于临川”。唐末,王安石曾祖父王永泰,“浏览山川,慕其地之善,遂徙寓于此,故为临川王氏之祖”。哲学家李觏,其先祖本系南唐宗室,始封临川,后徙金溪、泸溪、南城。文学家乐史,其父乐璋原籍河南,因“朱温抗京兆,乃游仕江左,为抚州临川丞,籍居临川”。由此,带来北方相对发达的农耕技术和家族文化。^[6]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村落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风俗、居住形态和金融行为。梁漱溟说过,“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就有形的来说,就是‘乡村’;就无形的来说,就是‘中国人讲的老道理’”。“老道理”的载体即是

① 关于担石村,笔者持续关注,所写作的文章有《担石李氏鬱林堂》载《寻根》2006年第4期;《金融需求、金融供给与乡村自治》,《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另外,还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经济学消息报》等撰写过有关担石社会、经济等内容的文章。

② 引自《鬱林堂大椿李氏族谱》。

③ 修水县志编委会,《修水县志》,海天出版社,1991。

收稿日期:2020-12-01

作者简介:李似鸿(1966-),男,江西修水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金融。

“乡村”。^①冯骥才认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灿烂和多样性都在村落里。”^[7]

克罗伯认为,文化是“人类具有的、其他社会种类缺乏的那种东西。……言语、知识、习惯、艺术和技术、理想、规则……我们从其他人那里,从我们的长辈和过去的事实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加上我们可能要加到其中的东西”。^[8]“文化是使人适应他自己环境的调节者;一种文化就是‘人调节他们生活环境的总和’……文化就是人对社会与自己关系的一种调节”。^[9]本尼迪克认为,“个人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就是他的不可能性”。^[10]“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是他们的文化,亦即他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和标准。”^[11]

斯科特认为:“一个村庄、城市或语言都是共同创造的,是许许多多人无意识的产物。……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和村庄)可以被称为‘深’或‘厚’的城市(和村庄),因为它们是大片的、已经逝去的、来自各种地位的人(也包括官员)在长期历史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也可以建立新的城市和新的村庄,但它们是‘薄’和‘浅’的城市(和村庄)……”^[12]“不用说农民是很熟悉每一种农作物以及它们的变种,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播种、耕地要多深、如何准备土地、如何照管和收获。要成功地种植各种作物,必须要有关于降雨和土壤的地方知识,甚至要详细到了每一块田地的特征,而这些知识是对特定地区才适用的。”……“共同的纽带、与血亲和姻亲的关系、互惠与合作的网络、地方的慈善与依赖,这些都是村民在过去缺少食品的时候能够生存下来的主要手段。”^[13]

村落以聚居为主,散居也日益增加。德芒戎认为,“聚居是大家定居在村庄内,散居则是分散居住,标志着个人倾向战胜了社会倾向。”^[14]“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农业经济是影响居住形式的三大因素。”^[15]“在聚居和散居之间,还有一些过渡形式……农村居住形式的定义,也不应当是房屋数或居民数这种纯统计的问题,它应主要包含着人们对居住形式及其农业土地两者关系分析的内容。”^[16]“村庄就是靠近、接触,使思想感情一致;散居则‘一切都谈的是分离,一切都标志着分开住’……从散居人口到聚居人口,有时存在着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的深刻差距……在村庄地区是集体行动的便利,配合的意识,外来影响的渗透和传播。”^[17]

格雷夫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与特定的宗教、种族或家族集团中的成员发生社会、经济方面的联系,而在这些集团里,合同是通过‘非正式’的经济、制度得以履行的。但是,不同集团成员之间是非合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体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分隔的’。集体主义社会成员的价值观中,觉得自己与同一集团的其他成员息息相关,视合作与奉献为集团的福利……不过,它限制有效的经济体间代理关系,而且,一般来说限制了个人创新精神,也不利于通过发展公司、法院等适当的组织进行‘匿名的’交易。”^[18]

如何打通不同村落在文化、习俗和观念之间的藩篱?格尔茨说,“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地方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方式来把各式各样的地方知识转变为它们彼此间的相互评注:以来自一种地方知识的启明,照亮另一种地方知识隐翳掉的部分。”^[19]

关于村落金融,早在春秋战国时,农民“终岁勤劳,不得以养父母,又称贷以益之”(孟子《滕文公上》),需要“赐鬴寡,振(赈)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管子《禁藏》)。年岁不逮时,“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史记·卷十九·货殖列传》)。族田和社仓是传统村落金融的重要载体。族田“以养济群族,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择族中长而贤者主其计,而时出纳焉”(钱公辅《义田记》),起到“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张载集·宗法》)之作用。“凡民间收获时,随其所赢,听出粟麦建仓贮之,以备乡里借贷,曰‘社仓’。公举殷实有行谊者一人为社长,能书者一人副之,共领其事”(《大清会典卷一二》)。村落近似于一个功能完善的自治体,祖堂是议事厅,后院是私人场地,前场是公共空间,村边河流、树

① 钱理群. 志愿者文化丛书,《梁漱溟卷》,三联书店,2019。

本是生态循环系统,周边田地是可持续发展保证,水利灌溉是互助合作的纽带;^①祖堂、祖宗牌位和祖宗墓地,似在解答着人“从哪来、到哪去”的哲学难题。

如今,虽无族田^②和社仓,但村落内在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扶贫济困精神,并不鲜见。^[20]宗族文化对村民集体行动和村庄治理仍有较大影响。^[21]张颐武认为要发挥乡贤在村落重建中的“黏合剂”“转换器”和“安全阀”的作用。^[22]龙登高等认为,传统中国基层各种事务多由民间自我管理,并自发形成制度秩序,通过自我筹资、融资提供乡村公共产品供给,通过在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层面中多维度地发挥作用,成为政府连接、沟通和协调基层的中介与桥梁,也成为大一统政权低成本维系基层统治的制度基础。^[23]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与二元经济结构相伴的,是金融的二元性,即城市金融深化、农村金融抑制。^[24]笔者认为,对于农村金融,也要一分为二,甚至是一分为三。我国农村金融往往指县域金融,县域金融包含县城金融、乡镇金融和村落金融。如今,金融机构密布于县城,有限分布于乡镇,村落则处于空白状态。因而,当前的农村金融呈三元结构,县城处于金融深化状态,村落处于金融抑制状态,乡镇所在地则介于二者之间。

本文可能的新意,一是把乡村振兴置于村落发展层面上,使乡村振兴落在具体的“经济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上;二是基于对货币与劳动的分析,发现二者都具有静态和动态的特性,不少村落往往是二者的静态结合,亟待将二者转变成动态的结合;三是提出二元经济结构在我国有着不同的内容,即劳动与资本的双重闲置和双重外流是造成乡村相对落后和贫困的原因。本文结构正是据此进行安排并展开,在第二部分梳理货币属性、金融形态和资金供求,第三部分针对劳动属性、劳动供求和劳动转移情况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货币属性、金融形态与资金供求

(一)货币属性

1. 第一种属性

货币的第一种属性,也是货币最基本的属性,是交易属性;即在交易中,货币被用于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属性。

这一属性,完美地体现于马克思的“商品—货币—商品”(即 $W-G-W$) 公式中。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农民,生产并售卖农产品,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购买生活消费品,先卖后买,为买而卖。此时货币体现“价值尺度”“流动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当然还有其他职业者),完成了“商品—货币—商品”这一流通和交换过程后,即马克思所说的简单再生产,又回到了起点,重新开始生产。^[25]“因此,这一循环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26]

此时的货币是用来交换物品,充当生产和生活之间的桥梁,避免了没有货币时,不得不进行物物交换时的各种不便。“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与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27]正是这种交易属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为买而卖、先卖后买的这个“2 X 2”难题,得以顺利解决。“简单的直接交换有很大困难。如果存在一种为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接受的商品,这种困难就可以消除。同时这种商品将作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而发挥作用。这正像分数相加要先改为公分母一样。这种商品就叫货币。”^[28]“货币的功能之一,就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浓缩并且表达物品的经济意义。”^[29]“货币的价格将其衡量的对象大范围、多种类的意义都凝聚成一个统一体。”^[30]

货币的这一属性,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交易范围、交易规模、交易速度、交易频率、交易效率、交易保障,都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提高。“在这里,流通的着眼点在于使用价值,而同一价值量总是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货币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实现商品形态变化的单纯媒

① 水利灌溉与互助合作之间的关系,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在《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研究》(《经济学(季刊)》2018年第一期)就有较好的论述。

② 《黄克诚自述》中记载,他上学的费用,即是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的。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

介,因此货币是作为货币的货币。”^[31]

2. 第二种属性

货币的第二种属性,就是投资(投机)属性,这是货币最重要的一个属性;即货币,在用于生产和流通之后,能产生一个比当初投入更大的量,多出来的部分,一般称之为投资(投机)所得。

马克思“货币—商品—货币(增加了的)”(即 $G-W-G'$, $G' = G + \Delta G$) 资本流通公式,与上面的简单商品流通公式正好相反,在这里,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卖而买”。首先手头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用来聘请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或购买相应技术),修建(或租赁)厂房,添置机器,购买劳动、原材料,进行产品生产,然后再售卖出去;产品变现后,取得 G 和 ΔG 。货币的投入是为了带回更多的货币,因此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是为了执行资本的职能而去投入的。也可以通过使用货币对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低买高卖,赚得差价(套利)。前面的一般叫投资所得;后面的往往叫投机所得。

凯恩斯则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人们对货币的持有情况分为三种动机,“一是交易动机,即需要现金,以备个人或业务上作当前交易之用;二是谨慎动机,即想保障一部分资源在未来之现金价值;三是投机动机,即相信自己对未来之看法,较市场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从中取利”。^[32]“在正常情况下,为满足交易动机以及谨慎动机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大致定于经济体系之荣枯以及货币所得之大小。……货币需求之用以满足投机动机者,则常随利率之改变而改变……”^[33]这里,前两种动机是用来满足交易对货币的需求,体现的是货币的第一种属性;第三种动机是用于投机对货币的需求,低买高卖以赚得差价,体现的是货币的第二种属性。

3. 第三种属性

货币的第三种属性,是调控属性,即货币掌握在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手中,用于对宏观经济实施调控。关于这一属性,从凯恩斯在 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后,已成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向公开市场上回购短期国债来增加货币投放,以刺激经济摆脱萧条走向复苏;在经济过热时,则反向操作,给膨胀的经济降温。此时的货币,就成了伸缩经济的工具,彰显其对经济的调控属性。

溯本追源,晋代鲁褒在《钱神论》中,就有“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钱不如天;达穷开塞,赈贫济乏,天不如钱”之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则表达得更清晰,“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白居易集·卷六三》)。只不过,在凯恩斯这里,论述得更加系统,在技术层面上赋予了一定的可操作性。

4. 三者之关系

从第一种属性到第二种属性,货币由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到能够带来一个比当初的投入更大金额的货币数量,取得投资所得或者投机所得。“货币提供了一种标志化的参照,使我们可以衡量资产价值,由此实现不同类型资产的交换,可是,即使货币有这样的用途,它也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将某种特定资产的抽象潜能固定下来,并使之转化为资本。”^[34]货币由第一种属性发展到第二种属性,需要有怎样的转化条件呢?

一是企业家的出现。在第一种属性中,货币只是用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只是一种静态的循环流转;在第二种属性里,货币被用于投资,将各种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形成产品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售卖,获取利润或差价,则是一种动态的循环流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是货币由第一种属性向第二种属性转变的重要因素。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职能是“创造性的破坏”,其创新行为是商业周期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35]鲍莫尔将企业家分为创新型企业家和复制型企业企业家,复制型企业企业家往往只能创造他们所知道的已经存在了的企业,而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能够创造新的产品和劳务,并改变原本的市场状况。^[36]显然,消费者手中的货币,是越用越少的,并最终是要被消费掉的;而企业家手中的货币,则越用越多,最终会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

二是人口自由流动。如果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农民尽管也是一个生产者,但只是作为小农特征的农民,其生产目的,只是为自己和家人的消费;即使把多余的产品卖出去,也只是为了换取货币,以买进自己和家人所需的消费品。一旦完成“物品—货币—物品”这一流通过程,不管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还是作为消费者的农民,复又回到了当初的起点。此时的货币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作为投资的货币,是用来有效配置生产要素并实现利润的,货币必须掌握在具有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手中,对市场具有敏锐的观察能

力和发现能力,从而把货币的第二种属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之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7]

三是所有权制度的建立。货币化的财富,是“死资本”(dead capital),而资本化的财富,才是“活资本”(living capital)。“死资本”只能以资产形式存在,并只能服务于眼前的物质需要,“活资本”即是通过正规所有权制度,将资产中具有经济价值的部分,形成并表述出一种共识。“把资产中所有相关而重要的信息予以掌握和管理,使一种资产的潜在价值变成一种概念化的产物,以便于我们对资产加以控制,我们就可以在所有权范围内,确认和开发资产,把它们加以组合,并与其他资产建立联系。正规所有权制度就是资本的水电站,资本也由此产生。”^[38]上述的“死”“活”之分,也正是货币的第一种属性与第二种属性的重大区别之所在。

货币的第三种属性,既建立在前面两种属性的基础之上,又影响着这两种属性。货币的交易属性,表现为“固定地用来充当一般等价物”,要求货币像尺子和戥子那样,在丈量物品的价值时分毫不差。一旦经济波动,引发货币当局关注并做出反应,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增减货币供应;其结果,货币对商品价值的衡量就会发生变动,货币的尺子和戥子作用就会伸缩。当下农村里,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下来的,大多是持币待购的消费者,不少村落中的农民,正如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所说,已经成为“居住在农产品生产地的、不再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产品消费者”。^[39]显然,一旦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物价波动,留守在农村里的消费者和小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性和投资性较弱,在较高的货币增速下,其利益更易受到损害。

(二)金融形态

金融,是指资金融通和风险管理。资金融通,实质上就是货币融通,即资金以货币的形态在富余者和短缺者之间流动,一般表现为生活性借贷,既包括无息的友情借贷,也包括有息的商业性借贷;风险管理,实则是资金以资本的形式在运动,资金转变成投资,风险就此产生,面对各种可能的风险,需要进行管控,以取得收益,实现利润。改革开放前后,金融形态在乡村先后表现出“实物融通”“资金融通”和“信息融通”(即“物融”“金融”和“信融”)三种形态。

1. 实物融通

传统村落中,早年由于货币稀缺,村民之间的借贷,难以通过货币方式进行,往往是实物之间的往来。这时的金融,实则是“物融”,即实物融通。

货币短缺的情况,通过表1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初,生产1元钱的GDP,M2的供应是0.31元,当时人均储蓄存款才20余元,全国各项贷款余额才1890亿。有限的货币供应,大多集中在城市和国有单位,很少流向村落。

表1 改革开放后 GDP、M2、M2/GDP、居民储蓄存款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单位:亿)

年份	GDP	M2	M2/GDP(%)	居民储蓄存款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978	3645	1159	31.80	211	1890
1982	5323	2590	48.66	675	3163
1984	7208	4146	57.52	1215	4747
1993	35333	34880	98.72	15204	32943
2000	99214	138356	135.68	64332	99371
2002	120332	185007	153.75	86911	131294
2005	183084	298756	163.18	141051	194690
2008	300670	475167	158.04	217885	303395
2011	484123	851591	175.90	343636	547947
2014	635910	1228375	193.17	485261	816770
2017	827121	16766768	202.73	643768	1201321

数据开始由笔者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整理而成,后根据吴晓求文章订正^①

^① 根据笔者备课本上历年数据整理,开始并不精准,后来阅读到吴晓求文章,并根据其文章数据进行订正。参见吴晓求《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金融的变革发展》,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11)。

村落获取货币的唯一来源,就看能否售卖农副产品,由于没有自由市场,连温饱都尚未解决,“W-G-W”这一流通公式中,既缺少“W”,又缺少“G”,卖与买都十分困难,不少需要货币的地方,就以实物替代了。笔者读小学时,因无钱交学费,大家交的往往是鸡蛋、粮食等,每到学期结束时,老师上学生家催收学杂费和课本费时,收到的大多是粮食等实物。大多数村落里,母鸡就是银行,鸡蛋就是通货。

最极端的例子,是笔者的一位堂兄,在 1963 年结婚时,因为没有钱给新娘做新衣服,不得不向同村的小叔借裤子,小叔正好做了一条新裤,给自己即将迎娶的新娘,面对借裤子的请求,虽万分不情愿却无法拒绝,只得亲自跟着侄子去接新娘,待新娘一进门,就督促侄子让刚进门的侄媳把裤子脱下。小叔还要用这条裤子娶回自己的新娘呢。如今,当年的两对新人,已是耄耋老人,说起往事,还禁不住一阵唏嘘。

货币匮乏,对生活和生产的影响甚大;投资一说,则无从谈起。投机,更是禁止和打击的。笔者的父亲,因为负担重,想搞点收入,在家里(林区)做了几只杉木箱运到木材较少的湖北和安徽去卖,就差点因“投机倒把”罪获刑。这时是不会有 ΔG 出现的,也就不会有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尽管洛克说过,人们之所以发明贝壳、金银等货币,一是由于贝壳、金银经久耐用,二是它们令人喜爱。因此人们相互同意,可以用它们来交换真正有用但易于坏掉的生活必需品。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货币)不容易变坏,所以人们通过劳动能够占有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40] 由于货币供应紧张,对交易严格管控,也就不能通过货币运动来获取并积聚财富。

2. 资金融通

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的余粮多了,售卖给国家后,就有了资金。“增产了、吃饱了、钱多了、自由了。”^[41] 同时,乡镇企业发展后,可就近找事做,领工资。年轻人可以外出打工,每月都有货币收入。同时,国家对货币的投放也日渐增多。从表 1 可知,1984 年 $M2/GDP$ 还是 57.52%,居民储蓄存款 1215 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4747 亿元;1993 年就分别到了 98.72%、15204 亿元和 32943 亿元;2002 年,即正式加入 WTO 的第二年,就达到 153.75%、86911 亿元和 131294 亿元;2005 年则到了 163.18%、141051 亿元和 194690 亿元。如今,即使是中部地区的偏远乡镇,其储蓄存款一般都在数千万元,不少超过了 1 亿元,有的乡镇甚至是数亿元、十数亿元。

此时村民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由“物资融通”发展到“资金融通”,村落“金融”回归到资金融通的本义。但此时的资金融通,实际上是“货币融通”,即源于生活和消费而融通。留村的大多是老幼妇孺、鳏寡孤独,村里的创业投资活动稀少,货币的投资属性难以体现。此时的资金只用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消费,体现的是货币的交易属性;货币的投资属性,尤其是投资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还处于稀缺状态。

3. 信息融通

2017 年, $M2/GDP$ 是 202.73.52%,居民储蓄存款 643768 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 1201321 亿元。即使是偏远乡镇,仅农村商业银行一家,存款过亿的就不少,但因缺少投资机会,难以转化成贷款。村民手持的是“货币”,因未使之“活”起来,不能转化成“资本”。这种状况,又分为两种,一是缺少相应的投资机会,不知道把钱投向哪里;二是即使机会来了,又难以识别和把握。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返回村落,接他们班的,是农民工二代和三代。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最大区别,就是进厂的热情和积极性下降了,自己创业和投资办厂的热情较高。他们从父辈的辛苦劳动过程中,感受并学习到了该以怎样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他们把家里这些年通过打工取得的收入,或者是把不动产抵押取得的贷款,带到全国各地寻找投资机会。资金投向什么地方、什么行业,则取决于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此时的金融形态,已由货币性融通,向投资性融通转变。这时,投资信息的获取和投资机会的把握,又至关重要。这种投资性融通,实则是信息融通,即“信融”。

金融形态的三种变化,正好反映了资金由货币的交易属性,向投资(投机)属性转变的趋势。在“实物融通”和“资金融通”阶段,体现的是交易属性,其目的仅是满足消费,或者是简单再生产。只有到了“信息融通”阶段,资金向资本转变,向风险管理转变,货币的投资属性才显示出来。货币由交易属性向投资属性转换,取决定作用的是持有货币的人的变化。即当货币只体现交易属性时,货币持有者只是一个消费者,或简单再生产者,货币仅发挥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当货币持有者成为一个生产者和企业家,从事扩大再生产时,

货币的投资属性才得以体现。

(三) 资金供求

1. 基本情况

笔者曾从2012年到2018年,持续调查并统计了赣西北、赣中、赣东南三县近100个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乡镇支行2012年和2018年的存贷款情况^①。6年来,各乡镇的存款和贷款,绝大多数都增加了,且增幅较大;但存贷比情况,35个乡镇支行增加了,46个乡镇支行则下降了。

在2012年,3县共82个能统计出存贷比的农商行乡镇、城郊和城区(含营业部)支行中,存贷比在10%—20%之间的乡镇支行有5家,在20%—30%之间的有29家,在30%—40%的有12家,在40%—50%之间的有10家,在50%—60%之间的有9家,在60%—70%之间有5家,在70%—100%之间的有3家,超过100%有9家。即存贷比在50%以下的有56家,占机构总数68.29%,即三分之二多,40%以下的有46家,占网点总数的56.10%。

到2018年,三县共87个能统计出存贷比的支行中,存贷比在10%—20%之间的有9家,比6年前增加了4家,其中有两家还在10%以下,这样低是6年前所没有的;在20%—30%之间的有21家,减少了8家;存贷比在30%—40%的有24家,比6年前增加了12家;在40%—50%之间的有11家,比6年前增加了1家;在50%—60%之间的有4家,比6年前减少了4家;在60%—70%之间有5家,与6年前持平;在70%—100%之间的有3家,持平;超过100%有10家,增加了一家。2018年,存贷比在50%以下的有65家,占机构总数74.71%,比6年前增加6.42个百分点;40%以下的有54家,占总数的62.07%,比6年前净增5.97个百分点。

2018年存贷比最低的是7.89%,比2012年存贷比最低的13.28%,还要低5.39个百分点;2018年存贷比最高的是347.78%,比2012年最高的216.98%,还要高130.80个百分点;2012年存贷比超过200%的支行只有一家,2018年则有4家,且有两家超过了300%,另一家则也到了293.91%。存贷比过100%的都是城区或城郊的网点,是县城的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所在地。显然,这些比其吸收的存款要多出来的贷款,来源于乡镇网点。可见,与2012年相比,2018年,有更多的乡镇存款被县城的网点拿去放贷了。

农村商业银行在乡镇设立的支行,一般都有信贷权且都开办了信贷业务,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村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乡镇网点,大多只吸收存款,因没被授予信贷权、或者说授权的金额较小,这些网点很少发放贷款,或只发放了很少的贷款。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农村乡镇总的存贷比,在现有比率上,还要下调10—20个百分点。

2. 贷款外流

2018年暑期,笔者对家乡的大椿、溪口、西港、杭口、马坳、渣津、大桥、上杉、山口等9家农村商业银行乡镇支行进行调查,得到的情况如下:一是存贷比大多在30%左右;有两家超过50%的,是因为镇上开发了不少新楼盘的原因;二是所发放的数量有限的贷款,当中的一半以上又被外出打工创业的带到外面去了,能够留在乡镇的贷款低于一半,即15%左右。通过进一步调查得知,在该县农商行40亿元的贷款余额中,大约有50%—60%的贷款,即22亿元左右,被外出打工者带到外面去了。

笔者在溪口镇调研时,该网点负责人李行长介绍,这里出去创业的人,大多是“一把铁锤、一台机器(二手居多,约7—8万元)、一片小厂”;以村落为单位,在外抱团发展。如陈坊村一带,在广州花都做手袋,投资过千万的手袋厂有两个,投资数百万的则不少,但大多资金自筹,或从民间借贷,从农商行镇里支行(农村信用社)借贷不多,只有80余万元。北岸村在温州一带做镭帽加工厂,从镇里支行借贷188笔,约740万元,平均每笔贷款约4万元。大石口、祖马等村,2017年因史上最严厉的环保政策,不少镭帽厂的生产受到影响,当年还贷困难,正当李行长担心由此引起不良时,市场却因镭帽减产,价格上涨,2018年,这些幸存下来的小厂的财务情况,迅速好转。蒲口、吴家湾、甘坑等村,在宁波等地做电镀产业,原本是全镇最富裕、信用最好的村,也是镇支行的贷款大户和黄金客户,由于电镀本身对环境污染大,在环保风暴中全被关停,600多万元

^① 三县资料的获取,得益于该地相关部门对我这些年研究的持续支持,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贷款到期无法回收,成为不良,信贷员正为此一筹莫展。其他乡镇农商行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相同的是在当地发放的贷款,大多被外出打工创业的带出去;不同的只是贷款被带出去的地方不同,所从事的产业和所受到环保政策影响的程度不同。

面对资金大量外流,我问银行对此的想法。对方说,我们也希望发放出去的贷款能用在本地,但当地确实没有需求。吸收的存款是要付利息的,只要能及时还本付息,贷款外流又何妨。我们今年,还准备去广东、浙江、江苏等本地外出打工创业人口集中的地方,进行贷款推介活动呢。在笔者写作此文时,即2019年4月份,该县已在广东等地举办过了贷款推介活动,现场签约热烈。

(四)小结

无论是产品流通公式“商品—货币—商品”,还是资本流通公式“货币—商品—货币(增加了的)”,所体现出来的,是“特殊性—一般性—特殊性”和“一般性—特殊性—一般性”的关系,这时的货币,就具有哲学意义了,货币成了一座架设在“特殊”和“一般”、“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桥梁。

正如席美尔所说,“货币在朝着纯粹概念方向发展,并逐渐脱离了对物质的依附……货币受到广泛的文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同时,货币又是导致这个发展趋势的独立因素……货币作为功能或符号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它已经遮蔽了货币作为物质的意义。”^[42]“在知识发展趋势中,事物的意义在 terminus a quo(本源)与 terminus ad quem(目的)之间交换了位置。货币拥有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是什么,而在于它为之服务的最终目的。”^[43]

用于消费的货币,处于持币待购状态,不论是留在手中,还是存入银行,实际上是处于“静态”和“闲适”中。用于投资或投机的货币,则处于“动态”和“运动”中。当前乡村过低的存贷比,说明其资金大多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未能转化成“作为投资的货币”。即使有一部分资金由存款转变成贷款,贷款却被带往外地。乡村自身的收入来源,因缺少投资所得,只能依靠劳动所得。随着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乡村的用工量日益减少,劳动所得也越来越少;同时,资金闲置下的劳动投入,往往只是简单劳动,边际效率低,劳动报酬低。

乡村资金闲置和资金外流的原因,与货币由第一属性向第二属性转化的条件在乡村的缺失有关。即拥有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人少、人口在乡村范围内的流动不够、乡村财产大多还处于“死资产”的状态等。乡村往往是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血缘合作、地缘合作,是一种关系型信用,虽说村内是合作的,但不同村落之间、宗族之间则是非合作的。与城市相比,乡村在社会治理、产权保护、政府对金融的支持方面,仍然不足。同时,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商业化改革取向^[44],也在促使资金与劳动总是在不断地向城市流动。

货币由第一属性向第二属性转变,还是政府、财税、金融、保险协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在贫困偏远地区。如江西省南城县的某贫困村实施成功的一个山羊项目,是在政府为羊舍提供每平方300元的补贴、财政为贷款提供贴息、保险对山羊进行风险保障、畜牧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和疾病防治的基础上,农村商业银行才对养羊户发放信贷、并取得满意效果的。当前乡村,大部分种养活动,都难有这样完善的服务和全面的保障,金融网点只能“惜贷”。

三、劳动属性、劳动形态与劳动供求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劳动属性与劳动形态的一般论述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由它自己的活动,来引起,来调节,来统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人要作为一种自然力,和自然物质互相对立。他会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所有的自然力,推动他的臂膀和腿,头和手,以便在一种对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的物质。但是,当他由这种运动加作用于他以外的自然,并使它发生变化时,他同时也改变着他自己的自然。”^[45]

“劳动会消费它的物质要素,它的对象和手段,消耗它们,所以也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由下述一点区别的:在个人消费中,产品是当作活着的人的生活资料消耗的;在生产消费中,产品则是当作劳动、活动着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被消费。所以,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自己;生产消费的结果,则是一种和消费者有别的产品。”^[46]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有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

劳动和社会劳动,另外,还有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

活劳动指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脑力和体力的消耗。物化劳动指凝结在劳动对象中体现为劳动产品的人类劳动。即劳动者借助于劳动资料进行劳动,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生产出新产品。“当资本家把货币变成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物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变为自行增殖的价值。”^[47]

简单劳动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任何专门训练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48]复杂劳动是指经过专门培养和训练、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创造较多的价值。从事复杂劳动的,“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物化为较多的价值。”^[49]

具体劳动又称“有用劳动”,指生产目的、劳作方式、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生产结果都各不相同的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又称一般人类劳动,指撇开各种具体形态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形成价值。

私人劳动是指,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性质,是私人劳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性质,是社会劳动。^[50]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生产者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归其所有;但作为社会劳动,作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他的生产却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他的产品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51]私人劳动若不能转变成社会劳动,其劳动成果就不能货币化,更不能资本化。

个别劳动时间是指商品生产者生产某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52]

综上所述,劳动既有不同的属性,也有不同的形态;既可处于闲暇状态,也可处于工作状态。如果长期闲暇,实则是处于失业状态(自愿或非自愿),不仅不能创造财富,反而只能消耗社会财富。当然,闲暇和工作如何平衡,既取决于宏观政策,又受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劳动属性(休闲与工作)与货币属性(消费与投资),劳动形态(具体和抽象、简单和复杂、私人和社会)与金融形态(物资融通、资金融通和信息融通),大体相若。

(二)劳动供求

以担石村为例,由于是山区,地多田少,山地种红薯、玉米,小麦、大豆等,稻田一年三熟——早、晚两季稻,种油菜或绿肥过冬。改革开放前,人、地、田都不闲;之后,随着劳动力外流,先是山地荒了,再是稻田闲了,由三熟到两熟再到一熟。

山高路远,肥料要挑上去,粮食(杂粮)得挑下来,山地上的劳动强度极大,由于面积远大于稻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与庄园),投工量远比稻田多,山地抛荒了,等于省下了一大半劳动投入。稻田闲了,由三熟到一熟,相当于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劳动投入。甚至,连自留地、菜园子也荒了,或者半荒。这方面,也省下了不少劳动投入。如今对农业的劳动投入,仅仅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六分之一,甚至更少。精壮劳动力外出后,留下的是老幼妇孺,缺少年轻人,整个村落就显得散了。笔者伯父去世时,抬逝者上山的八大力士(山高路陡,一般要求年轻人)都凑不齐,可见村落的“空心化”程度。

不少村落的日常,是白天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笔者带学生到某村落调研时,经过一农家院落,只见院内锁着仨小孩,六只小手就抓在院门栅栏上,六只眼睛紧盯着门外的小路。问怎么锁里面了,大人呢?小孩说,爸妈打工去了,奶奶到村头的小卖部打麻将去了……村里的墙壁上到处刷着“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和“珍视生命、远离艾滋病”的标语。小卖部里,好几张自动麻将桌都在忙着,边上还有不少老人在围观。而笔者所在的家乡不远处,半年前,留守在家带小孩的婆媳俩,都去打麻将,把正在哺乳期的小孩放在家里,睡着

的小孩嘴里塞着奶嘴,盖上被子,待婆媳俩打完麻将尽兴回来,小孩则被憋坏多时。

1. 一般劳动供求平衡

图 1 为一般的劳动力供求情况,此时的均衡点为 E_0 ,均衡就业量的 N_0 ,均衡工资水平为 W/P_0 。此时, ON_0 是就业情况, N_0 后则是自愿失业状态。由于劳动供求是可以自动调节的,就业市场总能达到 E_0 这一均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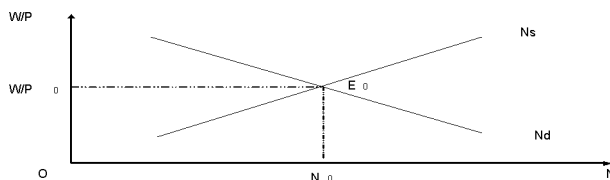


图 1 一般劳动供求均衡

但图 1 只能是说明一般情况下的劳动力供求情况。或者说,只是市场条件充分下的情况,不存在就业市场的分割、封闭和多元等情况。

2. 低水平劳动供求平衡

图 2 和图 3,是低水平的劳动力供求曲线,分别具有前倾和后屈的特征。图 2 表明,当工资水平太低时,一份工资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寻找第二份工作,甚至是多份工作。此时,正常的 8 小时工作时间,显然是不够的,不得不利用晚上、周末、节假日从事兼职工作。即工资水平太低,劳动的供给不降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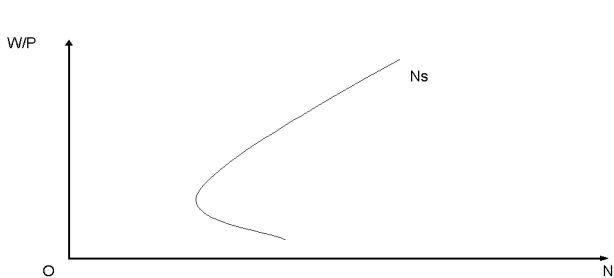


图 2 前倾的劳动供给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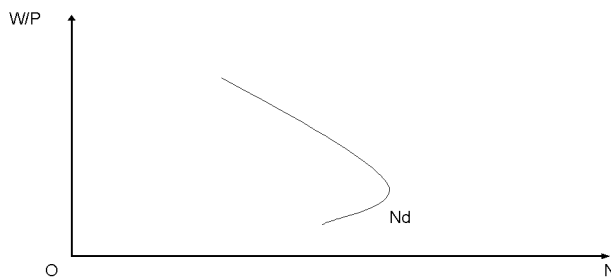


图 3 后屈的劳动需求曲线

图 3 表示,在劳动的需求方那里,由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源质量低,劳动技能差,哪怕只需付很低的工资,也不愿意雇佣这样的劳动力。毕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的设备投入日益增加,需求的是拥有相应技能的劳动,并愿意付给较高的工资。劳动者若缺少相应的技术和能力,即使工资很低,在劳动市场上,对其需求也是日益减少的。同时,由于存在就业市场的分割和歧视,乡村劳动不能到城市和工业中去,人为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等。

把图 2、图 3 合二为一,即为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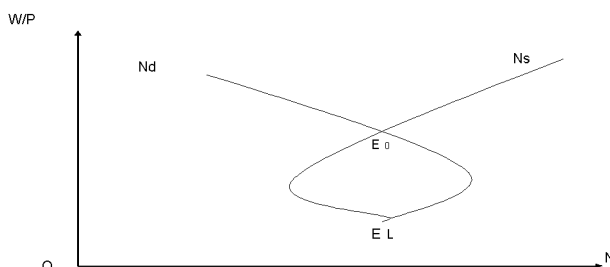


图 4 低水平劳动供求均衡

图 4 中,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在转折点后由负转正,供给曲线的斜率由正转负,两线相交于 E_L 点,是劳动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点。此时劳动供给方的特点,用马克思的话说,一是简单劳动,供给的劳动中,既没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也没有相应的“物化”劳动,除了劳动者自身,没有“消费”任何的物质工具、装备和设备。二是私人劳动,且难以转化成社会劳动,即劳动的投入,很难换取相应的货币收入。三是低效劳动,所生

产的物品,其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所得,只能用于简单再生产自身,甚至连再生产自身都顾不上,需要他人和社会的救助,显然,这种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很难找到相适应的需求岗位(不少地方往往通过启动财政资金购买公益性岗位以助其就业)。这种人力资本含量低、所推动的物质装备少、边际效率低的劳动供给,其工资水平,远远低于正常供求均衡点的水平。如果没有外力介入,往往是终年劳碌,一生贫穷。

3. 高水平劳动供求平衡

图5、图6是高水平的劳动供求曲线。在图5中,随着工资水平上升,劳动的供给是增加的,但当工资提高和劳动供给持续向右上方提升,劳动的供给曲线开始后仰了,在高工资水平上,劳动的供给不增反降了。这就是霍夫曼所说,随着劳动的持续投入,收入的持续增加,闲暇变得越来越重要了。^[53]同时,受人的生理因素限制,毕竟,每天就是24小时,再忙,收入再高,也是需要休息和恢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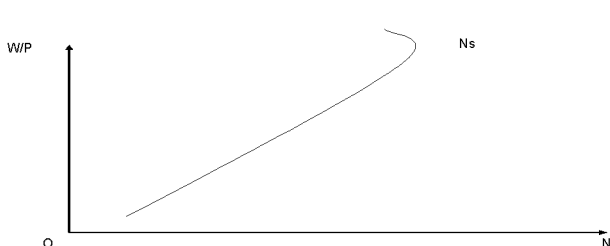


图5 后仰的劳动供给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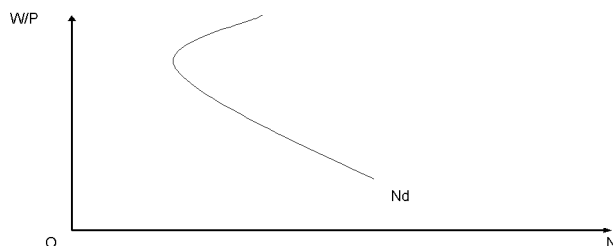


图6 前倾的劳动需求曲线

图6的曲线表明,在工资水平较高的那个位置上,对劳动的需求曲线开始前倾,斜率由负转正。即此时,尽管劳动者要求的工资水平高,但对其的需求不降反升了。具体表现为,那些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专业技术人员,或企业管理人才,尽管所要求的工资较高,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往往供不应求,且一将难求。如在建筑市场上,每天100-200元工资的小工好找,但高报酬的技术工人难招。在新茶采摘加工的清明前后,采茶女工好找,但制茶师傅难寻(一个好的制茶师傅,采茶季时的工资,往往在20万元左右)。在猎头市场上,那些优秀的企业家,尽管年薪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但找到一个称职的企业家,殊非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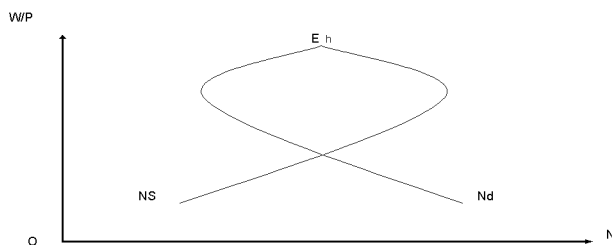


图7 高水平劳动供求均衡

将图5图6合拢,即成图7,即在劳动的高端市场上,劳动的需求曲线经过高位转折之后,斜率由负转正,劳动的供给曲线的斜率则由正变负,两线相交于Eh。此时的劳动供给特点,用马克思的话说,一是复杂劳动,供给的劳动中,既有大量的知识、技术含量,也有着大量的“物化”劳动在其中,这种劳动供应,是活劳动与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较高的技术要求的叠加;二是社会劳动,这种劳动不只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而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提供的,是为市场需求“量身订做”的,不存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三是高效劳动,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远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所得,除了用于再生产自身,用于满足家庭消费和发展,还有剩余,还能为社会提供积累。同时,这样的劳动者,在劳动市场上很容易找到相适应的需求岗位。显然,这种人力资本含量高、所推动的物质装备多、边际效率高的劳动供给,尽管其价格要高于正常供求均衡点的水平,也很容易找到需求方,在正规的就业市场上就业较易,如果是自我雇佣,往往是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或者是其他种、养、加大户。且这种劳动的供应者,除了通过劳动取得较高收入,还有其他非劳动所得,如资本所得、管理所得、专利发明所得等。

4. 三种劳动供求平衡

把图 4 和图 7 结合起来,则有了图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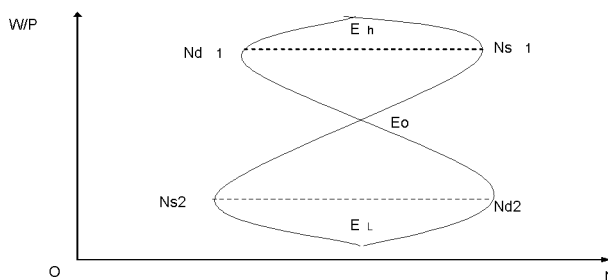


图 8 劳动供求的 3 种均衡

图中,不断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出现了 3 次相交,有了 3 个均衡点:EO 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市场均衡点,此时出现了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劳动市场处于出清状态。EL 点是劳动市场低水平均衡点,Eh 点则是高水平均衡点。改革开放前后,先后经历图 8 中劳动供求的 3 个均衡点。

一是在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各种票证的严格使用,城市等非农业部门岗位不对农业劳动力开放,农村劳动力不得不全部窝在农村。此时的劳动供给曲线具有负的斜率,即收入越低,劳动的供给越多。在需求方面,首先是农业投入集中于集体经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控对非集体经济性质的劳动需求。其次是对非农业的重视和支持不够,尤其是“投机倒把”罪的存在,限制了农村商业的发展,减少了对农业以外的劳动需求。再次是城乡分割的用工体制,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业劳动力哪怕要求的工资再低,也没有可能向城市转移。这样,劳动供需就处于 EL 点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其特点是长时间、低收入、少保障,处于隐蔽性失业或严重的内卷化状态。^[54]

二是改革开放之后,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取消了各种票证,用工市场的限制有所改变,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以深圳为代表的沿海、沿边城市和经济发达省市。随着联产承包的进行,和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同时,随着劳动力自由流动,可以在较大程度平滑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性质的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这样,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国有与私营之间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越来越趋向于由市场决定,市场上的劳动供求,易于形成均衡。此时的劳动市场,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由负转正,并一路向右上方扩展,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由正转负,不断向左上方伸展,二者相交于 Eo 点,形成一般均衡。

三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乡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城乡劳动的报酬持续提高。随着收入水平日益提高,闲暇对于人们的效用也就越来越彰显,劳动供给曲线开始出现后仰趋势,其斜率由负转正。同时,中外之间在一般产品的制造与生产之间差距在缩小,单纯依靠低成本竞争来发展经济的道路受到抑制。基于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之路日益重要,创新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劳动市场上,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些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一定的管理能力,能够推动较多固定资产的劳动力,越来越抢手,也越来越稀缺。劳动需求曲线的斜率开始由负转正。此时,表现在劳动市场上,就有可能形成第三种均衡,均衡点在 Eh 上。

5. 劳动后仰点的两种不同位置

把图 6 的后仰劳动供给情况,细分为图 9,有两条在不同位置后仰的劳动供给曲线。一般地,受劳动者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文化程度、传统习惯、宗教信仰、家庭负担等因素影响,对劳动和闲暇的理解和偏好是不一样的。

图 9 中,一是劳动供给曲线 Nsr 后仰的时机偏后,后仰点的位置较高,这类劳动具有忙的特征,而劳动供给曲线 Nsp 的后仰点的位置偏低,这类劳动具有较大的闲的偏好;二是 Nsr 的位置,要比 Nsp 的位置靠前,即在低工资水平上,前者的劳动供给数量要少于后者的劳动供给数量,而在高工资水平上,前者的劳动供给数量又要远远高于后者,后者具有“未富先闲”的特征。

进一步分析,高收入群体,由于劳动供给曲线后仰位置较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较高,较易积累更多财富,形成较多的金融资产,进而,在其收入构成中,由最初的劳动所得占主要,渐渐转变为资产所得占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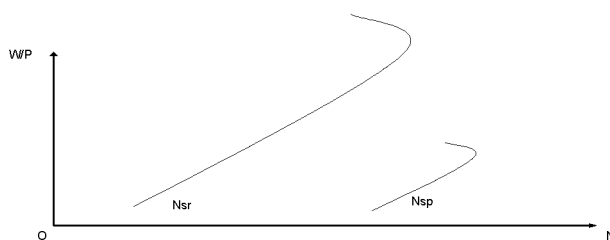


图9 后仰的劳动供给曲线

而那些劳动供给曲线后仰位置较低的,即使在收入较好的时期,也只能解决温饱,在其收入构成中,主要是劳动所得,难有资产所得。一旦经济形势有所波动,就业市场出现反复,这批人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又会陷入低收入状态中。

劳动供给曲线象 N_{sr} 那样,后仰点处于较高的位置,从我国农村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大概有三种情况。

一是联产承包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释放,起早摸黑,早出晚归,此时的后仰点位置较高。早先那种出工不出力的状况,转化成剩余劳动并转移出去。此时劳动供给曲线由图 2 所示的低位前倾迅速发展到低位后仰。

二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曲线的后仰位置,也是较高的。又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改革开放初期,与留村的相比,外出打工要多出不少费用,如往返路费、房租水电、中途回家探亲费用、小孩暑期过来探视的费用等。不管是在工地上,还是在工厂里,除了正常的 8 小时外,都会主动要求加班加点,以争取更多收入。第二种情况,是第二代或第三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赤手空拳出门不一样,一般都要从家里带(借)一笔资金出门,在外面开片小厂,要给工人发工资,要付资金的本息,加上全家老少的生活开支,不敢有丝毫懈怠,其劳动供给曲线的后仰点位置,也是较高的。

三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专业化要求和专业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此时的劳动供给曲线高位后仰。自然经济,缺少分工和市场交换,农民为满足自己和家庭消费,在有限的土地上什么都要生产,面积小、品种多、产量少(产量大了也没有出路),生产活动完全受制于自然条件和气候情况,一年有忙有闲,劳动供给曲线的后仰点位置自然不高。一旦农业生产专门化、专业化,需要有相应的农业科技、机器设备、化肥农药、生产服务投入,农业到了一个高投入、高产出和高收入的“三高”阶段,生产的农产品不仅仅用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甚至是国际市场。此时劳动供给曲线高位后仰。

在劳动供给曲线上后仰点位置比较低的,就像图 9 中的 N_{sp} 的,也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联产承包之后,劳动者有劳动的自由,也有不劳动的自由。有的人不劳动的自由占上风,加上本来就人多地少,承包土地不多,不需要太多的投工量,剩下的时间大多是在闲暇中打发。这些人除了农忙外,平时一般不会主动找事做,能闲则闲,只要不饿肚子。其劳动供给曲线,后仰点位置较低。

二是由于劳动力外流,留守下来的劳动力不多,造成农村人力紧张,人工工资上升。只要出门,愿意帮工干活,每天可挣得到一两百元钱。由于生活成本较低,干一天活,可以用来生活好几天,若连续做上十天半月,则可休息更长时间。如果以既定时间的收入为目标函数,此时劳动供给曲线的后仰点位置较低。另外一种情况是,有的地方工资又太低,干上几天活,挣不了几个钱,反正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也就不指望靠着出卖苦力再多挣这几个钱,干脆一边歇着。这时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后仰点位置同样偏低。

三是原来可以做的事,现在却不值得去做,做了不赚钱甚至要亏本,不如干脆在家闲着。比如养猪,原本是必须的,由于粮食和饲料涨价,散养时间长,不仅不赚钱,反而要亏钱,就干脆不养了。白天打麻将,晚上跳广场舞,基本上都闲暇在家,生活来源全靠外面寄回来。留村人员大多是半劳动力,或部分劳动力,做不了对体力要求高的重活;同时要照顾家里的老弱病残,不能出远门找事做。这时的劳动供给曲线后仰点位置,也是很低的。

劳动供给曲线后仰点位置,还与当地的文化习俗、对劳动的认识与态度有关,或因外出少、生活闭塞,对现代物质生活和精神文明缺少了解且没有要求,守于一隅,安贫乐道,“老婆孩子热炕头”,“薯丝饭、木炭火,

神仙日子不如我”,过着闲适贫穷的生活,其劳动供给曲线后仰位置自然偏低。由于劳动生产率低,劳动产品和劳动剩余,也就有限,甚至不足以供自己消费和生存。然而,半劳动力和部分劳动力,也是劳动力,也要加以有效利用(比如日本的农业),劳动本身具有时限性,否则,当用不用,过期作废。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一个永恒的自然必要性,没有它,就不会有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也就不会有人类生活。”^[55]

(三) 劳动转移

1. 初级转移

改革开放初,劳动力“离土不离乡”,然后是“离土又离乡”。往往是村里有人先到某地,发现那里工作好找,收入不错,随即就有亲朋好友前往,再然后就是本村的青壮劳动力集中流向该地。比如担石村,因先有人深圳横岗一带落脚,就带动大量乡亲前往,在横岗 189 工业区,到处都是同村人,像是担石村在那里的“飞地”,有人干脆称之为 189“担石村”。这种劳动力的流动,基本上印证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用图 10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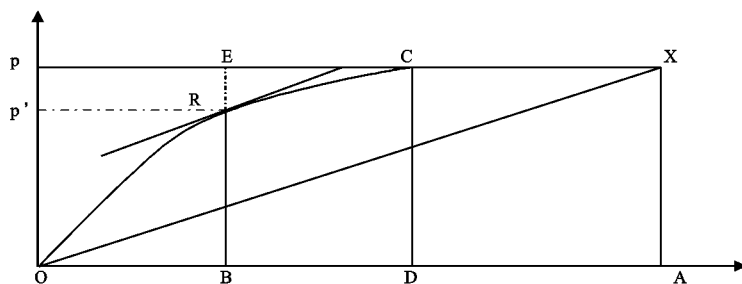


图 10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业生产效率关系图①

图中,横轴 OA 代表农业劳动力,纵轴 OP 代表农业总产出,ORCX 代表农业边际产出曲线,R 点的切线与 OX 平行,OR 曲线呈边际递增的特点,R 点之后的曲线呈边际递减的特点,过 C 点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是剩余劳动,是改革开放后率先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尽管其边际生产率为零,没有给社会提供农业剩余(total agricultural surplus & average agricultural surplus),但他们在村时,是解决了自己口粮的;转移到城市后,并没有随身带着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口粮,必须向市场购买。从这个意义上讲,留村劳动力的生产和劳动强度,实际上是增加了的,与原来相比,需要生产并提供更多的“农业剩余”。同时,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原来耕种的土地,要由留守下来的耕种。因而,留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与之前相比,要有相应的提高,才能保证原有的农业总产出不下降。考虑到要供应外出者的口粮,留村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还应有所增加。

另外,BD 数量的劳动力,只生产 RE 数量的农产品,显然,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全社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需要进一步转移出来,否则,这部分农业人口会相对贫困化,并造成全社会劳动力的平均效率下降。实际上,这也是紧接着第一批劳动力从村落流出后,原本留村的劳动力,发现一年辛辛苦苦下来的收入,要比打工低不少,也就开始了从村落向城市转移。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和本世纪初,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多数就属于这一部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后,农业总产出从 OP 下降为 OP',因此造成农产品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同样,这批人外出后,所需要的口粮,原本是自己解决的,如今要由市场提供,显然,留村劳动力,需要耕种的土地面积更大了,需要提供的农业剩余也更多了。

2. 高级转移

为了防止农业总产出的下降并增加农业总剩余,留村劳动力需要耕种更多的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从而生产出更多总产出和总剩余。如图 11。

图中,为了防止因 BD 部分农业劳动力流出后,出现农业总产出下降现象,需要加强对农业的投入,使农业总产出曲线向上平行移动,必须让曲线由 OXC 向上移动到曲线 OEM,其结果,BD 部分农业劳动力被转移

① 参见李似鸿,《农村金融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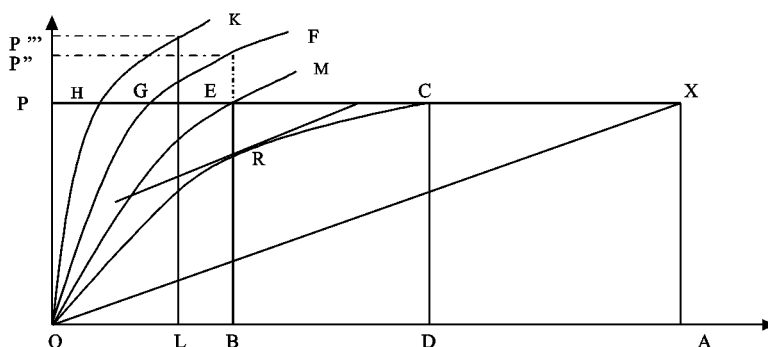


图 11 增加投入提高农业劳动力生产率进而提高农产品剩余图^⑨

出来,但农业总产出依然保持在 OP 水平。随着收入提高,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已由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变。餐桌上的食品越来越精细,蛋禽奶肉在食品中的占比越来越高,这样一来,人均粮食的消费量越来越高。在图 11 中, OP 数量的农业总产出显然是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消费需求。这时,农业总产出曲线,就必须由 OEM 继续向上平移到 OGF ,甚至更到更高更陡峭的位置,即 OB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要生产出 OP'' 数量的农业总产出。甚至,农业总产出曲线还要上移到 OHK ,由 OL 的农业劳动力,生产出 OP'' 数量的农业总产出。

随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由 OA 减少到 OD ,再减少到 OB ,继续减少到 OL ,甚至还会继续减少,留村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时,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机器设备、农业技术和农业服务的投入,即单个农业劳动力所需要的资产投入,是越来越多的。从世界各国来看,无论是美国等人少地多的国家所特有的大型农场也好,还是日本等人多地少的家庭小型农场也好,单位农业劳动所装备的固定资产和现代技术都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也就是说,农业劳动可以越来越少,但对单个农业劳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物质资本投入是越来越多的。

即伴随着农业劳力的转移,未必是农业资金的对外转移,否则,资金随人转移出去后,留守下来的半劳动力甚至是部分劳动力,是没有办法仅凭双手,依靠简单劳动,来从事人均(劳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大的农业生产,来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农业剩余越来越多的要求。或许,这就是防止农业衰败和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条件。

(四)小结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不满百的人生中,青少年和中老年,常常有着“闲”的特征,而青壮年阶段,则必须处于“忙”的状态。青少年的“闲”,是指因其心智尚未成熟,不得不把时间花在读书和学习上,实则也是“忙”的,只不过不是忙于生产和收入。中老年,心智已经十分成熟,之所以“闲”,是因为体力和精力下降,要养生和养老。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工作和生产中的推广应用,尤其是机器设备的大量使用,工作和生产过程中,对于体力的要求日益下降。表现在农村和农业中,随着各种农用机器设备的推广和使用,尤其是电子化、智能化、生物化、社会化,作为农民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寿命,亦可日益延长。这一点,在日本农业中就得到很好的体现。

当前农村,“未富先老”、“未富先闲”的态势日益明显,到处都是麻将和广场舞,而大量的土地则处于抛荒状态,优质、生态的农产品供应日益紧张,这就要求在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和机器设备投入的前提下,开展对现有乡村劳动力的组织动员、教育培训,增加对农业和土地的有效投入,以增加优质有机的农产品供应,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因而,在当前的乡村,迫切需要拥有企业家精神和才能的人,利用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济形式,把乡村劳动组织动员起来,同时,基于留守在乡村的大多是半劳动力和部分劳动力的实际,今后在对乡村的农机、农技和农资的投入和农业服务等方面,要有针对性和专门性,从而形成区域化、特色化、个性化、精细化的农业劳动投入,大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深化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使基层政府由目前的管理型向服

务型转变,使劳动供求状态由低水平均衡向一般均衡、由一般均衡向高水平均衡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货币具有交易属性(钱闲)和投资属性(钱忙),劳动具有休闲属性和工作属性。表2,即把货币与劳动的两种属性列出来,组合成四类不同的村落。第一类是人闲、钱闲;第二类是人忙、钱闲;第三类是人闲、钱忙,第四类是人忙、钱忙。

表2 根据货币和劳动属性划分的村落类型

货币	劳动力	休闲属性	劳动属性
		类型一:人闲 钱闲	类型二:人忙 钱闲
消费属性			
投资属性		类型三:人闲 钱忙	类型四:人忙 钱忙

第一类,人闲,没有劳动所得,钱闲,没有投资所得,村落自身没有产出和收入,完全靠村外汇款,其生产和生活都处于脆弱的状态,不能依靠内生动力生存和发展。第二类,只有劳动收入,没有投资收入,劳动与资本不能有机结合,只是简单劳动,劳动生产率也就难以得到提高,甚至,私人劳动若不能转化成社会劳动,会严重影响劳动收入。资金闲置,只能以货币形态存在,物价稍高,其购买力会逐年下降。第三类,人闲、钱忙,往往是资源型村庄,或者是城中村、城郊村,靠坐收房租、矿租、地租、股息、红利为生,具有一定的寄生性;由于人闲,人力资本得不到历练和提升,村落发展的后劲难以保证。第四类,人忙、钱忙,即人力与资本处于有机结合的状态,单位劳动力所推动的资产较高,所得也会高些,既有劳动所得,也有资本所得,且因使用现代机器设备劳动回报也较高。同时,人与机器的长期结合,人力资本也会得到持续的发展和提升,村落发展更易形成良性循环。此时的劳动供给曲线极易上升到高位后仰阶段。

实施乡村振兴的对象,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三类,则要规范和引导。怎样才能使人与钱,由“静”到“动”,由“闲”到“忙”,从而使村落由“贫困”到“富足”?

一是完善基层民主政治,落实基层民主,提升乡村官员的整体素质。人往高处走,资金亦然。人才与资金的“高处”,表面上是回报高,实质上是基层政府和社会管理的民主、公平、法制、透明、高效。这些方面,沿海和经济发达地方走在前面,所以人才和资金才会源源不断地流向那里。随着乡村一级官员素质的提高、治理的改善,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留下创业、就近发展,这样,人与钱就会结合起来,就会“忙”起来。

二是传统乡村在继续保持“集体主义”的优势的同时,还要借鉴和吸收“个人主义”的理性和效率。集体主义往往体现在村落内部,村落之间往往是“分隔的”,难以开展有效的合作。随着乡村振兴的实施,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自是应有之义,就需要在村落之间、家族之间交流合作,合同和契约的制订和遵守,除了“非正式”关系的维护,还要有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落实并完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当前,传统村落中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人,更愿意到城市和经济发达地方去,也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关系简单,只需遵纪守法即可,节约了交易费用,减少了不确定性。作为局部地方和局部知识的传统村落,需要在兼顾“地方知识”“特殊知识”的同时,要更多地吸纳“国家知识”“一般知识”。^①

三是要完善并落实已有的产权制度。全面落实“三权分置”改革,赋予农地以金融权,让农民承包的耕地、山地、林地、水面,甚至宅基地,拥有用于担保、抵押、出租等权利,既让这些“死资产”变成“活资产”,以留住本地劳动和资金,银行也因有更多合格的担保品而敢于放贷,甚至由此吸引外部智力和资金进来。让农户除了劳务收入之外,还要有劳务之外的资本和要素所得。农用机械、农用技术、涉农服务都要瞄准当前农村精壮劳动力大多外出,留村的大多是半劳动力和部分劳动力的现实,提供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各种生产和销售组织。使留守的半劳动力和部分劳动力,所从事的既是复杂劳动,还是社会劳动。

四是加大对村落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此推进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相结合。提升人力资本的好处,正如舒尔茨所说的,“农民所受的教育是解释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且按成本和收益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

^① 相关概念参见詹姆斯·C. 斯科特,《国家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利的投资”。“一个像其祖辈那样耕作的人,无论土地多么肥沃或他如何辛勤劳动,也无法生产出大量食物。一个得到并精通运用有关土地植物、动物和机械的科学知识的农民,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产出丰富的食物。”^[56]“向农业投资就变得有利了,这就开始了农民接受并学会最好地使用现代要素的阶段,对增加储蓄和形成对这些要素的投资提供资金的信贷机构,这也是一种引诱。”^[57]

当然,“闲”与“忙”,既对立又统一,只“闲”不“忙”不行,只“忙”不“闲”也不行。二者之间,该有一个适宜的比例。日本不少学者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负面效应显现后,出于对 GNP 第一、经济至上的反思,又开始强调村落的社会价值,认为村落是通过共同协作维持土地、农业及其相关的基础条件,带有相互扶助的特征,是一种共同体的、非市场性的组织。^[58] 家庭经营则具有自由和独立性,可以激励人的勤奋;具有由拥有土地和得以安居所代表的职业安定性。^[59] 农家所追求的未必是收入最大化,只要能确保一定的收入,农家就会增加余暇时间,追求人生的安乐。^[60] “农活”具有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意义,是人性的综合,包含着循环性、多样性、互动性和自我创造性等方面的内容。^[61] 并认为将来的村落社会,在维持其作为血缘、地缘以及由此带来的具有高度向心力和一定自律性的地缘性社会的同时,也会逐渐变成一个呈放射状或网状扩展的、由离心力所作用的信息网络社会。^[62]

参考文献:

- [1] 陈寿. 三国志·魏志·郑浑传,转引自辞海[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1415.
- [2] 马其昶校,马茂元整理.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642.
- [3] 衣殿臣编. 中国古典文学荟萃·郑板桥诗词选[M]. 摘自《山中卧雪呈青崖老人》,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93.
- [4] 陈友群. 熏陶教诲长铭感——回忆在朱德身边当秘书[J]. 北京档案,1996(7):32.
- [5] 陈正祥. 中国文化地理[M]. 北京:三联书店,1983:3-5.
- [6] 罗传奇,张世俊. 临川文化史[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2.
- [7] 郭熠,冯骥才. 最近10年我国失去了90万个传统古村落[N]. 天津:今晚报,2015-03-05.
- [8][9][美]克鲁克洪(Kluckhohn, C.)著. 高佳译. 文化与个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8;49.
- [10][11][美]本尼迪克(Benedict, K.)著. 何锡章译,黄欢译. 文化模式[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12.
- [12][13]詹姆斯. C. 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27;321.
- [14][15][16][17][法]阿·德芒戎著,葛以德译. 人文地理学问题[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77;151;189;192.
- [18] 埃维纳. 格雷夫(Avner Grief). 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J]. 刊于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第二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0. [美]约翰·N. 德勒巴克(John N. Drobak), [美]约翰·V. C. 奈(John V. C. Nye)编;张宇燕,等译.
- [19] 克利福德. 格尔茨. 地方知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66.
- [20] 党国英. 试论建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的重要意义[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5).
- [21] 叶静怡,韩佳伟. 村庄管理模式、宗族与选举问题[J]. 经济学动态,2018(9).
- [22] 陈宪. 一个乡绅治理的故事[J]. 经济学家茶座,2017(4).
- [23] 龙登高,王正华,伊巍. 传统民间组织治理结构与法人产权制度[J]. 经济研究,2018(10).
- [24] 麦金农著,卢骢译.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78.
- [25][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1.
-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1.
- [28] 威廉·罗雪尔.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
- [29][30] 席美尔著,朱桂琴译. 货币哲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96;97.
- [31] 许涤新. 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77.

- [32][33]凯恩斯著,徐毓枏译.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44;166.
- [34]索托著,于海生译. 资本的秘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1.
- [35]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36]Baumol, W. J. (1968), "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2):64-71.
-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3.
- [38]赫尔南多·德·索托著,于海生译. 资本的秘密[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28.
- [39]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 农民的终结[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40]洛克著,叶启芳,瞿菊农译. 政府论(下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31.
- [41]国家农委政研室. 1982年“百村调查”综合报告,载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007.
- [42][43]席美尔著,朱桂琴译. 货币哲学[M].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53;105.
- [44]张兵,曹阳. 商业可持续、支农力度与农村信用社新一轮制度变迁——基于苏南农村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10(6).
- [45][46]马克思著,郭大力,王亚南译.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171;178.
- [47][48][4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1;223;223.
- [50][51]许涤新. 政治经济学辞典[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46;347.
-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
- [53]霍夫曼著,崔伟,张志强译. 劳动力市场经济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9.
- [54]斯坦利·L. 恩格曼(Stanley L. Engerman). 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载新制度经济学前沿[M]. “新制度经济学译丛”第二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17-148.
-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6.
- [56][57]舒尔茨著,梁小民译.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4;110.
- [58][59][60][61][62]祖田修著,张玉林等译. 农学原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6;148;149;150;163.

Monetary attribute, Labor Supply & Demand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s

LI Sihong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ttribute, forms, supply and demand of money and labor,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capital and labor double idle and double outflow is the main cause of rural poverty. It puts forward that capital and labor should be changed from idle to busy, from static to dynamic, from loss to retention, and organically combined to respond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Village development; Monetary attribute; Labor supply; Rural Revitalization

(责任编辑:沈 五)